

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能轻易从经济绩效中寻找执政的安全感，
必须既做好发展经济的工作，也做好人的工作，才可能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与
繁荣中带来更高水平的执政安全……

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

全球化视野下五国执政党的比较研究

祝灵君 郭 玥 /著



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

全球化视野下五国执政党的比较研究

祝灵君 郭 玥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版式设计：鲍春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全球化视野下五国执政党的比较研究/

祝灵君，郭玥 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

ISBN 978 - 7 - 01 - 018577 - 4

I . ①经… II . ①祝…②郭… III . ①执政党-对比研究-世界

IV . ①D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5600 号

经济增长与政党认同

JINGJI ZENGZHANG YU ZHENGDANG RENTONG

——全球化视野下五国执政党的比较研究

祝灵君 郭 玥 著

人 民 *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03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8577 - 4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中国南方有不少乡镇的集体或民营企业开始进口一些发达国家的“洋”垃圾。许多人感到纳闷：这些垃圾是怎么进入中国的？为什么有关国家要把这些洋垃圾出口到中国，难道他们不担心污染中国的环境吗？洋垃圾中究竟能清理出什么“宝贝”，如果垃圾中有这么多宝贝，有关国家还会同意出口吗？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来管理垃圾出口？明明知道这些垃圾对环境有极大腐蚀和污染作用，为什么还会有地方政府支持洋垃圾进口？

通过访谈和观察，我们发现：第一，这些垃圾中能够回收一些有益的工业用品，如电子元件等，重新回收到生产线并制造出新的电子产品。虽然清理工作对当地环境造成巨大污染，但毕竟带来了当地“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同时也带来那个地方的政绩；第二，发达国家也乐于出口，既然有国家对垃圾感兴趣，自己不花钱处理垃圾还可以赚上一笔，何乐而不为？其实，这些洋垃圾有一部分是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制造的廉价电子产品，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这些电子产品时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廉价劳动力赚取了微薄的工资收入，带来了GDP增长，但大部分利润被海外投资商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尊重知识产权的规则下被专利产品的授权方拿走了。生产过程已经形成了一次环境污染，

而且大量工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产生了许多“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制造出无数个“夫离子散”的新型家庭，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治理成本。由于生产的这些产品技术水平比较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大方方开放了本国市场，以极为低廉的价格享受着发展中国家工人给他们制造的各种廉价的日常生活品，却无需支付多少环境和社会成本。

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大量的低端产品出口赚取了大量以美元结算的外汇。但是，美国人又想了个办法，即运用金融的杠杆作用，以政府债券、金融衍生品等引诱大量储备美元的国家去购买，于是美元又流回美国并增加了流动性，美国支付给这些国家的就是一张张能够获得利息的被称作政府债券的“纸”（1971年8月美元已经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本身并不具备价值，只拥有某种信任价值）。从理论上讲，美国人运用货币手段强迫购买国的货币升值（理由之一就是该国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就能让购买国储蓄的美元财产缩水，同时增加出口成本，遏制该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通过让美元贬值，就可以让政府债券的实际利息负增长，依然导致出口国的美元资产缩水；通过想办法提高美元利率，就让全世界的热钱流向美国，既增强了美元的流动性，也压垮了那些靠借债发展的国家，由于外汇储备急剧减少，这些国家立刻出现债务危机。结果，美国人几乎只用一张“纸”，就买来了全世界的产品和服务，削弱了竞争对手的实力，用“看不见的手”汲取了全世界的财富，不用担心环境污染，不用担心劳资矛盾，只需牢牢控制住高技术产品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两张王牌（当然，还有美军这个威慑力量作为后盾），用美元这张“纸黄金”就可以成功实现对世界的“征服”。最后，最极端情况下，还可以把自己消费后的垃圾送回到生产它的“故乡”去。

这只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小故事，却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也显

示了全球化时代由资本构建的新的不平等结构。从发达国家的眼光来看，全球化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有效配置：发达国家得到了所需的产品，发展中国家扩大了出口、增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产生了GDP。但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眼光看，这是一个高代价的增长，即有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主要表现为：环境污染加大、劳资矛盾加剧、家庭破碎、贫富悬殊拉大、对发达国家及海外市场的依赖性加大（一旦海外市场萎缩，订单就会减少，大量企业就会破产，大量工人就会失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等等，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及社会安全问题。当执政党（政府）不能有效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就会转移到政治方面，执政党可能会垮台，演变为执政安全问题。如此看来，全球化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是发展中国家自愿接受的阳谋，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执政党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

全球化主要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其背后隐藏着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基本事实。如今，美元本位时代的自由市场概念已经“偷换”了金本位时代的自由市场理论概念。在金本位时代，各国货币与黄金挂钩，贸易盈余导致黄金流入，贸易赤字导致黄金流出，这是一种相对公平的自由贸易或等价交换；而美元本位时代，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海外援助、投资、贷款等手段为世界各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流动性，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于是就出现了美元与各国生产的物品、服务之间的贸易，进入了美元变相对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的时代。在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理论指导下，“经济增长”一词给人一种“痛楚”的感觉：不讲“经济增长”，一国的财富难以增长；讲“经济增长”，容易坠入对发达国家新的依赖局面，或“有增长却无发展”的尴尬局面。这样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拉美国家已经经历过。“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迎来经济迅速增长的骄人成绩，巴西一度达到

年均经济增长 10% 的速度，智利则是另外一个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典型。80 年代伊始，这些国家大都调整国家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大幅度取消政府的产业政策，倡导自由贸易，开放金融领域，赞誉新自由主义，希望借全球化之大势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而推动国家战略转型的则是一大批从欧美留学回来的经济学家、国内贸易商和军人独裁政权，他们与西方资本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支持下有着“改革家”的美誉。不料自 1982 年开始，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世界经济萧条使这些高度外向化的国家遭受沉重打击，产生了必然要发生却几乎没有预料到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淀的财富毁于一旦，许多国家的执政党也在不久或稍后失去了执政权，以保护主义为口号的左翼力量重新崛起。

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少数发达国家）其经济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着高代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广大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创汇一方面导致大量的资源配置在出口部门从而挤压内需发展，导致长时期内需不足，内需越是不足，在经济增长的冲动下，越容易形成对出口的依赖；另一方面，为了保值增值，储备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金融衍生品再次流回美国，直接导致经济资源从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第二，出口的规模越大，储备的外汇资产越多，在外汇资产增值的动机激励下，许多外汇储备被迫投放海外，越来越远离国内投资和实体经济，形成了高速增长掩盖下的出口部门繁荣昌盛，内需市场相对萎缩的“二元经济”格局。第三，在全球化时代，尤其是在金融衍生品市场日趋扩张的时代，有钱的人可以赚更多的钱，有劳动力的人赚不了钱，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收益率远远超过劳动力的收益率，贫富差距自然拉大，劳动密集型的区域其财富会自然流向

资本密集型的区域，劳动力供给充沛的国家其财富会流向资本供给充沛的国家，导致在全球范围内、一国范围内贫富悬殊拉大。而许多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由于出口部门占用的资源过多，往往导致国家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培育等方面投入不足，从而错过了许多本来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机会，而这一切代价都掩盖在经济高速增长和出口部门以及与出口部门相联系的部门“欣欣向荣”的表象之下。

今天，如此“高代价经济增长”^① 的故事还在世界各地继续发生，必然演变为经济安全问题，最终形成执政安全问题。本书主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是否必然带来政党认同；第二，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长远地看，是经济增长更重要，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更重要；第三，一国尤其是大国的执政党应如何审视全球化的风险，如何趋利避害，利用全球化带来的资源整合优势以造福广大民众，其最高境界是善于利用全球化的规则，巩固执政党认同，夯实执政安全，进而实现国家总体安全。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选择了一个很小的题目，却遭遇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当前，人类历史已经轻轻翻过了 21 世纪这个“千年门槛”，一个以全球化、互联网、新媒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为标志的“个体化”社会（individualized society）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全世界都被纳入到资本自由流动的秩序中，发达国家形成了以资本、技术、服务为标志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便宜的劳动力价格、资源、市场为标志的比较优势，整个世界形成了以金融资本为顶端的新的等级结构，

^① 中央党校前校委委员梁言顺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揭示了所有经济增长背后都有代价，突破了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坚持的“要素投入效果都是正向的”观点。参见梁言顺：《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私人资本对各国政治的影响力正逐步扩大（因为资本在全球流动并具有全球影响力，而政府权力只限于地方，具有地域影响力），执政党（政府）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管理）干预的能力正在不断弱化，甚至当以金融衍生品市场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执政党（政府）的干预几乎无能为力。劳动力与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尽管仍然处于“打架”状态，但彼此的依存度随着生产链条的拉长而不断降低，“打架”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的世界与过去相比较呈现出巨大的结构性差异，比如：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自从与黄金脱钩以后，已经不再是一般等价物；金融体系已经不再简单扮演与实体经济相连的中介角色，而是以虚拟金融资产的创造与交易为基础，独立于实体经济；生产要素不再构成普通的产品，买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卖，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能源、技术、生态等都可以变成投资品。与此同时，全球化和信息化让世界贸易进一步拓展，发展中国家正在城镇化进程中阔步前进，贫富悬殊不断拉大，世界各国的“命运”从来没有如此唇齿相依，经济增长开始依赖于国际国内众多因素。

因此，探寻提高执政党认同度的规律也变得更加困难，但并非不可捉摸，这需要高度关注“世界大势”，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看清本质。那就是，执政党（政府）在追逐经济财富时始终不能忘记经济安全，唯有建立在经济安全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财富增长，才能构建一个安全执政的国际国内环境。这意味着，应该用执政党（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引导并连接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延伸一国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实现一国或多国的经济共同增长，在造福本国人民的同时也造福相关国家的人民；同时，执政党（政府）也要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在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构建廉能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巩固阶级基础、密切联系民众等方面大有作

为。这条规律用中国今天流行的语言讲：就是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增强国家能力；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做人的工作”；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两手都要硬，两手都不误。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001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政党政治巩固	002
一、基本文献分析	003
二、从英国的经济增长史中寻找答案	008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如何发生联系	015
第三节 执政党的经济改革方案如何影响执政党认同	020
一、改革的双重含义	023
二、发展中国家的“芝加哥男孩”现象	025
第二章 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的联系	030
第一节 经济增长降低选民的执政党认同 ——以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为例	031
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选民的执政党认同关联度较低 ——以美国为例	034

001

第三节 执政党组成情况与经济增长关联度	038
第四节 全球化背景下检视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认同	042
第三章 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050
第一节 墨西哥的政治生态与政党政治发展	051
一、墨西哥独立前的经济与政治发展状况	051
二、墨西哥独立后的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	053
三、墨西哥政党体制与经济发展	055
第二节 1929—2000 年间墨西哥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059
第三节 革命制度党为何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失去执政权	065
一、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应对两次危机的教训	065
二、革命制度党失去执政权的三个致命因素	070
第四章 印度的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076
第一节 独立后印度的政治生态与经济增长	077
一、印度独立后国内的政治生态	077
二、政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083
第二节 国大党的经济改革与执政党认同	085
一、改革前的背景：国大党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	085
二、印度执政党在经济成绩优异的时刻丧失执政权	086
第三节 印度国大党、人民党为何在改革中失去执政权	091
第五章 俄罗斯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98
第一节 从苏联的一党制到俄罗斯的多党政治	98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99

二、一党集权体制的形成	101
三、俄罗斯政党政治的特点	102
第二节 苏联的改革与执政党认同	107
一、苏联改革的基本情况	107
二、苏共为何在改革中失去执政权	115
第三节 俄罗斯的改革与“执政党”认同	120
一、叶利钦时代的改革	120
二、后叶利钦时代的改革与“执政党”认同	136
第六章 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141
第一节 战后意大利政党体制的形成	141
一、意大利的主要政党及政党体制	141
二、政党组织的规模与政党认同：共产党与天民党的比较 ..	145
三、意大利的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151
第二节 天民党丧失执政权的几个原因	158
一、南北发展差异导致“南北联盟”问题	158
二、天民党的腐败文化	160
三、天民党阻碍地方自治的改革	165
第七章 新加坡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	168
第一节 人民行动党的崛起与新加坡的经济增长	169
一、独立初期的新加坡与人民行动党的诞生	169
二、人民行动党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	172
三、修正新自由主义，形成有新加坡特色的经济社会 发展之道	177

第二节 新加坡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的相关性分析	187
一、新加坡经济增长率与人民行动党得票率	187
二、影响人民行动党认同度的几个因素分析	195
第三节 主要结论	204
第八章 经验与展望	210
第一节 五国执政党认同的比较	211
一、五国经济增长比较	211
二、五国政党体制比较	213
第二节 初步的结论	216
第三节 对未来的展望	221
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38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美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指出：“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鉴于多种理由，在分析基本的社会机制和制度时，必须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①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天然联系，大多数经济学家或政治学者都善于用政治、经济两个视角交替看问题。

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亚当·斯密把他研究的经济学视作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为人民提供充分的收入和生计，更恰当地说，是使其能为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第二个目标是，为国家或社会提供足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收入。”^②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马克思、马歇尔等都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现象，同时也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现象，其中又以马克思最为典型。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分析入木三分，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当代政

^① [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页。

^②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治经济学文献中，新制度主义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毫不讳言对国家权力的研究应该成为经济学家的“必修课”。在新制度学派中，国家能否界定并保护产权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秘密，而在公共选择学派眼里，“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分析”标签直接贴在了现代政治分析的头上。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大大拉近了政治规律与经济规律的关联性，还原了人类实践理性的本来面目。

经济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表明，经济增长必然推进政治领域的变迁，而政治领域的变迁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伦·艾塞默鲁和哈佛大学政府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森通过多年研究发现再次证明了新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即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国家走向兴盛或衰败的最大原因。^① 当今世界，政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基本主体和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那么，经济增长与政党政治巩固有什么关系？经济增长（指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如何影响政党认同？执政党的经济改革方案如何影响选民的认同度？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政党政治巩固

近代以前（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全球经济增长一直在缓慢进行，尽管个别时期、个别国家、个别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较快。近代尤其是18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以国际市场不断扩展、产品和要素迅速流动、产权制度不断完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等为

^① 参见〔美〕戴伦·艾塞默鲁、詹姆斯·罗宾森：《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吴国卿等译，（台北）卫城出版2013年。

特征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①——现代经济增长，大大推进人类现代化进程，促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人类文明形态不断推陈出新，其中，政党政治的出现便是成果之一。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近代以前的经济增长中没有出现政党政治，而现代经济增长却促进了政党政治？经济增长与政党政治的出现有关系吗？如果有关系，那么经济增长是如何促进政党政治发展并巩固的？

一、基本文献分析

一般的经济学文献很少关注经济增长与政党政治的关系。比如，著名的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对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在1800年以前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国家保护产权（如鼓励创新的专利法的制定、通过土地使用法令消除封建奴役、股份公司取代过去的受控公司、有组织保险的出现、证券与商品市场的创造、银行的出现，等等）的具体措施和制度创新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根源，也是西方社会不同于东方社会而率先崛起的根源。早在15世纪，英国已出现阶级分裂，即出现以贵族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和新兴阶级为代表的资本势力在议院的竞争。至18世纪，这种竞争开始制度化，形成了以托利党和辉格

^① 对西欧12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1500—1820年的经济增长统计发现，公元1500年时12国的GDP总量为38459（百万1990国际元），公元1600年时为56822（百万1990国际元），1700年时为71077（百万1990国际元），而到1820年时则为142693（百万1990国际元），1920年为739408（百万1990国际元）。以一百年为单位，可以看出1500—1700年经济增长缓慢，而1700—1820年经济增速提高，1820—1920年之间经济增速大大提高。转引自〔英〕安格思·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6页。